

以色列的战时宣传缘何失利： 基于“阿克萨洪水”行动的解释

黄日涵 姚浩龙 刘炜辰

内容提要 宣传战已成为国际冲突的常见形式，在战时宣传中占据优势的一方能影响战场信息流动，赢取国内国际社会支持，掌控议题话语权，在国际舆论中获取主导权，进而影响地面战场局势。长久以来，巴以双方都意图借助国际国内媒体渠道，影响有关巴以问题的叙事话语走向。面对突发的“阿克萨洪水”行动，以色列通过积极设置舆论议程、双标定制话语情感表达、控制战场信息流动、善用高科技与跨国宣传网络等方式展开战时宣传，意图撇开巴以冲突的历史渊源，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归咎于哈马斯。以色列战时宣传虽在冲突初期获得一些国家的同情，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失利，并在国际上空前孤立。这种舆情转向的致因，与其说在于以色列战时宣传背离战场事实与效能下降、哈马斯采用后发制人的政治动员与宣传、新媒体瓦解了以色列所构筑的信息围墙，不如说以色列基于其秉持的绝对安全观造成巴以安全困境长期化，并陷入周期性爆发的态势。此轮巴以冲突宣传引起人们的审思：平息巴以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两国方案”，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各国欲寻求持久和平之道，需摒弃对抗的、孤立的、绝对的旧安全观念，构建互信、平等、包容、协作的国家安全体系。

关键词 巴以冲突 “阿克萨洪水”行动 哈马斯 以色列 战时宣传

作者简介 黄日涵，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姚浩龙，华侨大学世界文明对话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刘炜辰，华侨大学世界文明对话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一带一路’理念传播视角下的新媒体时代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21AGJ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撰写过程感谢西北大学王晋副教授、华侨大学王祎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陈菲副教授以及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2023年10月7日， Hamas宣布对以色列展开代号为“阿克萨洪水”（Operation al - Aqsa Flood）的军事行动，派遣武装人员从加沙地带大规模进入以色列南部边界，并向以色列发射超5 000枚火箭弹，导致以色列1 200多人死亡，251名以色列和其他国籍者被绑架。该行动引发以色列强烈抗议与反击，并直接对加沙地带 Hamas目标发起“铁剑”军事行动，新一轮巴以冲突正式爆发。截至2024年10月6日，加沙地带已有超41 870名巴勒斯坦人与千余名以色列平民和军人死亡^①，并外溢至伊朗、黎巴嫩等地，冲突烈度高居不下。此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将巴以问题再度拉入国际社会视野当中。

除了地面战场的激烈交火，巴以双方同样在舆论战场展开激烈对抗，意图占据国际社会道德高位，获取国际支持。在“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后，以色列迅速在各大传播平台上同步传播 Hamas袭击所造成的损失，传递 Hamas不断枪杀以色列无辜平民的“真实消息”^②；巴勒斯坦则对以色列轰炸无辜平民予以“直播”。长期以来，以色列一直围绕着巴以问题开展“哈斯巴拉”（Hasbara）战略，即希伯来语中“解释”一词，指以色列开展的减少外部世界对犹太裔“误解”的公共外交宣传。^③在该战略指导下，以色列长期在国际舆论场中，通过搭建自上而下、统筹协调的宣传架构、制定针对性宣传策略、干涉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来改善国家形象，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然而，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以色列的战时宣传行动不但没有改善其国际形象，反而成为国际舆论转向的“助推剂”：“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后，一些国家对以色列持同情态度，而 Hamas则遭到谴责。^④随着时间推移，巴以冲突中以色列的反人道主义行为被国际社会知晓，国际舆论风向逐步转

① 《365日，加沙战火如何蔓延至大半个中东？》，载环球网：<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JziCNZGgO>，2024-10-14。

② Zoran Kusovac, “Analysis: Propaganda, Deception, and Fake News in the Israel - Hamas Conflict”,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3/10/14/analysis-propaganda-deception-fake-news-and-psychological-warfare>, 2023-10-14.

③ Gideon Kouts, “From Sokolow to ‘Explaining Israel’: The Zionist ‘Hasbara’ First ‘Campaign Strategy Paper’ and Its Applications”, *Revue Européenne Des Études Hébraïques*, No. 18, 2016, pp. 106 - 112.

④ Cleary Waldo, Gabriel Epstein, Sydney Hilbush and Aaron Y. Zelin, “International Reactions to the Hamas Attack on Israel”,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international-reactions-hamas-attack-israel>, 2023-10-11.

变，对以色列的同情快速减少，随之增多的则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同情与对以色列空袭行动的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形象短时间内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

回顾当前研究，国内学者仅从侨务角度、新媒体角度对以色列战时宣传进行研究。^① 国外学者则对以色列宣传战略的作用、缘起与发展进行讨论，如有学者认为“哈斯巴拉”已然建立起系统模式，有力地提高了以色列在国际上的软实力与国家复原力（National Resilience）^②，而蕴含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以色列公共外交策略，其创新是由对国家合法性的追求与强化所推动、变化的。^③ 但内部政权的不稳定、资源供给失衡，加上以色列国防军填补政策实施主体空白所带来的“安全文化”的主导，使得“哈斯巴拉”战略作用发挥越来越差，^④ 甚至被认为是“语无伦次的叙述者”。^⑤ 总体来看，既有文献并未对此次以色列战时宣传中出现的舆论转向问题进行解读，只局限于对战时宣传本身的批评，更未关注到新媒体与高新技术发展对以色列宣传行为的影响，尤其是未将此类事件所折射出的相关事件背后本质来探究。基于此，本文意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在本次“阿克萨洪水”行动中，国际舆论对巴以双方的角色定位出现转变？

① 参见张梅：《试析以色列侨务公共外交》，载《现代国际关系》2018 年第 6 期，第 57～62 页；郑宇龙：《以色列新媒体公共外交——以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为例》，载《公共外交季刊》2018 年第 4 期，第 99～106 页；董青岭，孙瑞蓬：《新媒体外交：一场新的外交革命？》，载《国际观察》2012 年第 5 期，第 31～38 页；郭毅：《数字化公共外交：实践困境、理论缺陷与伦理风险》，载《未来传播》2021 年第 5 期，第 38～45 页。

② Molad, “Israeli Hasbara: Myths and Facts”, <https://www.molad.org/images/upload/files/49381451033828.pdf>, 2024-10-11.

③ Rudy Stoler, “Legitimizing Jewish Identity Amidst Chaos: Zionist Public Diplomacy”, *The Journal of Public Diplomacy*, Vol. 3, No. 1, 2012, pp. 54-65.

④ Gal Hadari and Asaf Turgeman, “Public Diplomacy in Army Boots: The Chronic Failure of Israel’s Hasbara”, *Israel Affairs*, Vol. 24, No. 3, 2018, pp. 482-499; Siman-Tov, David et al, “From Hasbara (Public Diplomacy) to Influence in the Gaza War”,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2023; Rommey Hassman, “The Israel Brand: Nation Marketing Under Constant Conflict”, Tel Aviv University Press, 2008; Dr. Moshe Dann, “Why Israeli ‘hasbara’ has Failed”, <https://www.israelnationalnews.com/news/319780>, 2022-01-03; Raoul Wootliff, “Dysfunctional Israeli Leadership Failing Utterly in Battle against BDS, State Watchdog Warns”,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dysfunctional-israeli-leadership-failing-utterly-in-battle-against-bds-state-watchdog-warns>, 2016-05-24.

⑤ Shaul R. Shenhav, Tamir Sheaffer and Itay Gab, “Incoherent Narrator: Israeli Public Diplomacy During the Disengagement and the Elections in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Israel Studies*, Vol. 15, No. 3, 2010, pp. 143-162.

一 战时宣传：国际行为体赢得舆论战的重要路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在联合国体系内创建国际组织、制定逐步完善的国际法体系，国际秩序逐渐趋向稳定，经济全球化下国家间相互依赖逐渐加深，新兴科技日新月异，传统军事手段在维护与获取国家利益方式中的重要性下降，宣传战、心理战与信息战等成为影响国家间冲突胜负的重要作战形式。在此背景下，获取舆论支持对国家在冲突与博弈中取胜而言极为重要。

（一）战时宣传：话语输出与国际舆论影响力

战争作为国家疆域扩张与矛盾解决的重要手段，已从早期的军队直接对抗发展成以地面作战为主，统合认知战、信息战等多种作战形式为一体的“多进程”行动。因而围绕战局所展开的国际舆论传播成为交战各方获得国际社会支持的重要手段。以重要符号为载体，如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其他传播形式，来控制意见，^① 国家通过战时宣传影响国内受众、敌国受众、中立国和盟国受众，并以说服、劝阻或欺骗等手段将目标受众的意见、情绪、态度等转变为有利于自身战争行为、合理化战争目标的国际与国内舆论。^② 国际舆论作为一种超越国家疆界，在某些问题上使不同国家成员达成一致的公共舆论。每当一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奉行某种与此类人类意见相抵触的政策或采取这类行动时，民众就会自发地对当事国实行抵制。^③ 从历史上看，正面舆论不仅能帮助交战国获得国际支持，维护自身交战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而且能提高国内支持从而增加可投入战争的资源；相反，负面舆论会不断瓦解交战国行为合法性并削弱国内支持。因此，交战国围绕战时宣传展开的舆论战与信息战对地面战场的的影响极大，甚至有时能决定战争走向。

在对外战争或冲突中，一国开展战时宣传、提升国际话语权对取得比较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其一，汇聚国内不同群体共识，凝聚行动合力。一国能够通过战时宣传阐明战争目的，清晰界定战争胜利条件，控制战争相关舆论

① [美国] 哈罗德·D. 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张洁、田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② 同上书，第161页。

③ [美国]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许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7页。

传递，滞缓乃至阻止负面信息传播，扩大正面报道宣传，引导国内外观众认知，进而充分鼓动民众自发支持国家战争行为，避免战争解释权落入敌国手中。其二，强化己方联盟、分裂敌对联盟。一国通过宣传机器传播正面舆论，帮助盟国塑造良好形象与声誉，增强结盟行为合法性，以强化联盟间纽带；同时使用针对性舆论攻势瓦解敌方内部宣传堡垒，通过夸大战争失利、激化盟友间矛盾等方式，打入“舆论性”楔子实现联盟分化。此外，对他国声誉污名化与战争形势误导性披露更能实现联盟预阻、瓦解敌国的国际支持。其三，提升国际话语权、形成话语势能。一国通过提升战争相关舆论解释和信息筛选能力，能够在国际议题上形成对该议题的权威性解释，使他国行为合理性下降乃至成为“政治不正确”，最终让自身在争议性议题或战争中占领道义高地，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其四，推动战场局势变化。战时宣传倘若取得压制性效果，处于弱勢的敌国军队与民众便会在海量信息中难以正确研判战争发展趋势。在缺乏舆论权威澄清与验证的情况下，大量难以辨别的负面舆论会严重打击军队与民众面对战争的信心与士气，战线可能一溃千里。

（二）宣传博弈：战时宣传主体的互动逻辑

无论是国际制度抑或国际舆论场，国际行为体在话语权争夺中存在零和博弈^①，在同一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的竞争方间博弈尤为激烈。每一方都需要争取国际国内观众的认可和赞同，为此甚至在战争开始前便展开宣传活动，以获得更高的国内社会支撑。^② 战时宣传由国家从上至下推广至舆论场域中，作用于主客体间互动过程，直接表现为个体间语言交流和交战方舆论对抗。因此战时宣传既具有权力属性也具有主体间性，这导致同一舆论在不同受众间出现效果差异。正如拉斯韦尔认为，成功的宣传依赖于有力的社会力量帮助、建议选择 and 传播工具的运用，操作技巧与组织方法。^③ 在此，本文参照约瑟夫·奈关于将权力划分为“权力资源”与“实现权力的途径”的思考^④，

① 杨庆龙：《增强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国际机制的路径》，载《学术探索》2016年第8期，第31~35页；吴佳坤、吴飞：《动员、博弈与说服：俄乌冲突中的舆论战探究》，载《传媒观察》2022年第6期；第50~55页。

② Chad W. Seagren and David R. Henderson, "Why We Fight: A Study of U. S. Government War - Making Propaganda", *The Independent Review*, Vol. 23, No. 1, pp. 70 - 71.

③ [美国] 哈罗德·D. 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第159页。

④ 周鑫宇：《公共外交的“高政治”探讨：权力运用与利益维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98页。

将交战方的战时宣传要素划分为“宣传资源”与“宣传能力”。

从内涵来看，宣传资源是指国家在战争议题或其他相关领域中已建构的叙事结构、舆论浪潮与声誉。它代表着一国能够使用的影响力资源，如一国在国际社会中持有相近立场的媒体与平台资源、已受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信息资源等。这是一国在国际上表达意见、寻求认同、塑造声望的出发点与依仗，也是国家对舆论传播与控制的基础，决定了宣传方能否将宣传信息这一“刺激”精准投射于受众认知层面。^① 宣传能力则包括对宣传资源的运用与开发能力、宣传主体内部统筹协调能力、与其他国家和社交平台的合作协调能力等，代表着国家开展战时宣传的方式路径与行为模式。从国际传播格局发展趋势来看，新媒体与互联网的出现重构了信息传递格局与传递方向，信息传播去中心化与信息交互复杂多元化客观上部分消解了国家与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权威。以社交媒体、社交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手段的出现让信息生成与传播更为快捷，并导致国家宣传能力与综合国力日益分布失衡；拥有较强传统或新兴媒体掌控力的国家能够影响信息流动，进而实现对舆论的传播与控制，而缺乏媒体掌控力的国家则与之相反。以国家在某一议题上宣传资源与宣传能力的强弱对比，可将行为体大致区分为四类（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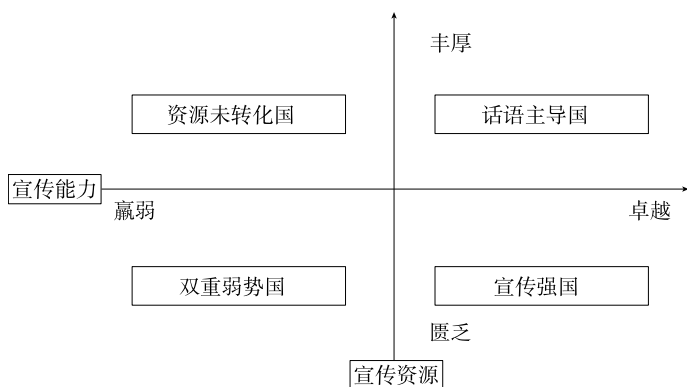


图1 战时宣传中的国家分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般而言，国家在战时宣传领域的两种要素相互影响，并随着国家与国

^① [美国] 哈罗德·D. 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第151~153页。

际社会间互动而发展。一方面，宣传资源影响着国家塑造议题的方式以及话语产出内容，宣传能力则能够充分挖掘一国所拥有的宣传资源。二者结合所形成的强大传播能力能够一定程度上影响乃至主导国际话语信息的传播。另一方面，战时宣传作用于主客体间互动过程，而话语的国际传播能力决定国际话语权^①，让话语“讲出去”比有内容“可以讲”更加重要。同时，交战双方的战时宣传效果往往具有零和性。因此，国家通常同时采取进攻与防御路径，既让受众产生对本方战争行为的理解与认可，又要拆解他国叙事框架与行为合理性，以达成获取公众支持、实现对敌国舆论压制乃至实质性影响敌国行为的效果。

在宣传资源—能力组合差异情况下，交战方战时宣传效果天然存在强弱对比，据此可以将交战方划分为宣传强势方与弱势方两种类型，不同类型国家宣传策略天然存在差异，随着战局演变，一国宣传策略也会出现动态变化。战时宣传效果与具体宣传方式紧密关联，而后者又与宣传客体、宣传内容以及相对军事力量、观众紧张程度、人际渗透、经济纽带等等因素息息相关。^②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宣传需要，国家会针对不同宣传场景与目标受众快速转换宣传方式与策略，提高战时宣传精细化程度。

在冲突早期，国家战时宣传焦点集中在国际社会共有知识和“真相”的主导权争夺上。各国凭借其较为成熟的传播渠道与成体系的叙事结构内容，统领国内外非国家行为体的行动，争夺议题中的空白话语空间，借助舆论宣传强调自身对该议题的话语权与解读权，攻击和解构他国话语逻辑，通过解读历史事实、攻击他国话语等方式强化自身叙事的正确性并瓦解他国叙事，促使他国话语逻辑失去国际观众信任与理解，为随后开展现实战场行动提供合法性支持。在这一过程中，拥有丰厚宣传资源的国家具备“先天优势”，能够依据既有史料、过往经验快速搭建自身话语体系与叙事框架，在国际舆论场中不断复述有利于自身的客观事实，强调自身对该议题的叙事主导地位，以呈现自身对该议题的既有议价权、主张的合理性和正义性。相较其他国家，这些国家话语更具真实性与可追溯性，可信度更强，由此搭建系统性话语体系的难度与成本更低。

^① 杨丽莉、李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意义、内涵和路径》，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第47页。

^② [美国] 哈罗德·D. 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第158页。

从根本上说，战时宣传服务于地面战场的胜负。在地面战斗爆发后，强有力的信息宣传能够为该方快速地凝结国际社会支持，因而宣传中的比较强势方会主动以“围堵诋毁”方式挑起宣传战。在对国际社会宣传上，强势方一方面在内容上全面围堵与破除弱势方的叙事逻辑，鼓吹与放大其行为的非正义性；另一方面，则通过掌控舆论传播渠道封锁弱势方信息传播，以重复性传播淹没弱势方战时宣传。同时，强势方借此为自身叙事结构填充丰富的“内容”，如强调自身行为正当性、回答国际社会疑问等，凝结国际共识、巩固舆论基础，为地面战场行动博取支持。与强势方相反，弱势方处于被动还击状态，只能实施“阐释解读”。在对国际社会宣传上，弱势方通过不断阐述和强调自身行为与叙事架构合理性，尽可能地对强势方的话语攻击予以解释和防御，保护自身叙事逻辑的合理性。在对盟友和国内社会宣传上，弱势方政府不断修补自身叙事框架，借助有限渠道进行宣传，甚至会通过信息封锁断绝国内外信息传播，维系国内支持群体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弱势方传播话语的效果与作用会被压缩，甚至会被诋毁扭曲。强势方则凭借宣传能力迅速压制并构建逻辑自洽的话语体系，甚至将替代原有事实的“人造真相”塑造为国际社会的集体记忆，进而实现战时宣传的碾压态势。

面对这一态势，弱势方只能借助新媒体与强制手段打破舆论信息围墙，试图在国际社会重新掀起对该议题的讨论。但这种“另起炉灶”的方式往往成本巨大，且实施效果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这种反击行为通常不具有国际社会中的“正当性”，强势方建构的既有优势舆论与声誉会让国际社会主动质疑其“反击”合理性，削弱劣势方突破舆论信息围墙的效果。例如，哈马斯发起的本次突袭行动后，其暴力行为和带来的巨大影响让其声誉跌落谷底；另一方面，战时宣传服务于地面战场的胜负，宣传优劣势在地面战场几成定局时无关痛痒，即使获得舆论支持也不一定能扭转地面战场局势。由于宣传资源和能力与国家硬实力有一定关联，具备强大战时宣传能力并已形成宣传优势的国家往往也能在地面战场取得优势，而弱势方只能被动等待外部势力介入、战场形势突变或以延长战线等方式争取扭转局势，但这一情况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对于弱势方来说时间消耗与成本极为高昂。

综上所述，由于不同战争主体存在宣传资源和能力差距，强势方与弱势方会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宣传策略，以维持与扩大自身在该议题上的话语权，削减、瓦解他方的宣传结构，最终推动该议题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二 “阿克萨洪水”行动中以色列的“进攻式”战时宣传

复合相互依赖理论认为，国家和国际议题间的紧密联系，让国家或国际行为体能够通过安全化、政治化等手段将某些议程上升到国际社会商讨的议程之首，以此来实现自身利益。^① 因此，国家积极设置议程，以此获得在某些特定领域的优先权或更大的影响力。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色列基于较巴勒斯坦方更强的军事实力、宣传实力，不断联合盟友施加影响，阻止有效解决方案的通过，意图将巴以问题长期排除在国际社会视野之外，以确立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中的话语主导权：在加沙地带，以色列长时间封锁信息传输渠道，多次拒绝外界人员与巴勒斯坦内部的交流沟通，控制内部信息流出；在国际社会，以色列的公共外交活动从未停止，借助西方媒体平台塑造国家形象，其盟友美国多次使用否决权阻止有关巴以问题的停火决议通过，不断调和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关系，意图通过推动阿以关系正常化来彻底边缘化巴以问题。面对国际社会此前出现的旨在打击以色列的“BDS 运动”（抵制、撤资和制裁），德国犹太人协会和亲以色列协会在德国联邦议院建立密切合作，促使 2019 年德国联邦议院通过决议，将该行动归类为反犹太主义并禁止其融资。^② 在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下，美国各州相继出台禁制法案，对支持这项运动的企业处以巨额罚款并禁止参与市场交易。^③ 在层层围堵下，巴以问题在国际社会中的讨论热度逐渐下降，巴勒斯坦人民的发展诉求、领土诉求乃至生命权逐步被边缘化、虚无化。

但突发的“阿克萨洪水”行动将因近来爆发的各种事件所掩盖的、逐渐远离国际媒体传播焦点的巴以问题重新拉回到国际舆论的中心，得以让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所作所为进入公众视野，这也标志着基于威慑、预警和快速

① [美国] 罗伯特·基欧汉、[美国] 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31～33 页。

② Matthias Gebauer et al, “Wie zwei Vereine die deutsche Nahostpolitik beeinflussen wollen”,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lobbyismus-im-bundestag-wie-zwei-vereine-die-deutsche-nahostpolitik-beinflussen-wollen-a-00000000-0002-0001-0000-000164871539>, 2019-12-07.

③ Human Rights Watch, “US: States Use Anti-Boycott Laws to Punish Responsible Businesses”, <https://www.hrw.org/news/2019/04/23/us-states-use-anti-boycott-laws-punish-responsible-businesses>, 2019-04-23.

军事决策原则的“以色列国家安全学说”的垮台。^① 面对袭击，以色列快速反应，充分利用其与西方国家和媒体保持的友好且牢固联系和长期以来构建的预期正面形象，对本次“阿克萨洪水”行动进行议程设置，主动通过舆情控制等方式继续压制哈马斯，实行进攻式的战时宣传行为，意图借此机会将哈马斯彻底塑造为阻碍巴以冲突解决的“罪魁祸首”，为以色列的反击行为博取国际支持。

（一）话语主导：积极设置和引导舆论议程，情感输出定制双方形象

早在2009年，以色列曾出版为以色列支持者撰写的话语脚本《以色列2009年全球语言词典项目》（*The Israel Project's 2009 Global Language Dictionary*），用以指导不同主体制定亲以色列的宣传内容与宣传策略，帮助以色列占得舆情上风。^② 在“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后，西方媒体迅速行动，对哈马斯展开全方位的舆论攻势，以在交战伊始便垄断信息源头。以色列通过海量舆论信息暗示或直接论述其行为的“反人类”特质，或对语句和形容词进行选择性地匹配，为哈马斯定制负面形象，博得公众支持。

首先，广泛传播哈马斯的突袭行为，以削弱其声誉与诋毁其国际形象。西方国家与以色列在国际舆论信息场域不断合作生产、扩散哈马斯突袭行为，意图在读者认知中扎下“认知种子”，通过话语重复不断巩固负面刻板印象。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后，西方媒体广泛报道哈马斯对以色列妇女儿童开展的暴力行动，详细描述受害妇女群体规模与悲惨遭遇，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例如，法新社报道称，以色列警方在冲突爆发后表示，已经收集了“超过1500多份令人震惊和困难的证词”^③；英国《卫报》将拥有以色列、德国双重国籍的沙尼·卢克（Shani Louk）的死亡与哈马斯的性侵行为混合报道，不断暗示受害者在死亡前也遭受了类似的暴力行径；^④ 《纽约时报》甚至以

^① Mohsen M. Saleh,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Operation Al - Aqsa Flood”,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231020-the-strategic-implications-of-operation-al-aqsa-flood>, 2023-10-20.

^② Frank Luntz, “The Israel Project's 2009 Global Language Dictionary”, <https://www.transcend.org/tms/wp-content/uploads/2014/07/sf-israel-projects-2009-global-language-dictionary.pdf>, 2014-07-09.

^③ Agence France - Presse, “Israel - Gaza War: Activists Decry Silence over Evidence of Sexual Violence in Hamas Attacks”, <https://www.scmp.com/news/world/middle-east/article/3243641/israel-gaza-war-activists-decry-silence-over-evidence-sexual-violence-hamas-attacks>, 2023-12-02.

^④ Bethan McKernan, “Evidence Points to Systematic Use of Rape and Sexual Violence by Hamas in 7 October Attacks”, <https://amp.theguardian.com/world/2024/jan/18/evidence-points-to-systematic-use-of-rape-by-hamas-in-7-october-attacks>, 2024-01-18.

《“无言的尖叫”：哈马斯如何在 10 月 7 日将性暴力武器化》为题出版专栏文章，基于普利策奖得主杰弗里·格特尔特曼对受害者的采访向大众阐述了一名以色列女子的悲惨遭遇，引起广泛轰动。^① 相较于西方媒体对以色列残酷行为的和善用词，如以“操作”等措辞来形容以色列的空袭行为，大部分西方媒体意图不断强化“哈马斯”与“暴力”“凶残”等词语在语义和语境上的紧密联系，“非人化”乃至“异化”巴勒斯坦人，试图强调其与传统西方文明之间的宽大裂隙来降低西方国家人民的同情心，并用“系统化”“有预谋”等词语形容哈马斯的暴力行为，不断渲染哈马斯的恶意，激起国际舆论对哈马斯的道德审判。

其次，以色列和西方媒体在议程设置与具体传播中注重共情力，通过“将心比心”等方式提高公众的代入感，为以色列的反击行为博得支持。以色列及其传播伙伴极其重视对哈马斯行为事件的报道用词，常常通过类比过往历史、使用特定形容词等方式进行政治隐喻，选择性框定公众的注意力焦点，让其针对性地获得某种心理暗示，进而使其对目标形成定制身份认知，最终通过宣传产生巨大的政治传播效应。^② 西方媒体对哈马斯的负面信息报道通常极为详细且言辞激烈，通过讲故事等方式引起观众对受害者的同情与怜悯，如使用“残酷”（brutal）等情绪化语言形容巴勒斯坦方的行动占据总报道内容中接近八成，只有少数报道使用类似词语来形容以色列行为。^③ 对以色列进行的袭击行为信息传递则较为模糊，使用较为温和的词语来叙述事实，如将巴勒斯坦方遭袭情况报道刻意淹没在对以色列所遭受的惨痛打击的报道当中，来减少观众关注度。例如，《华盛顿邮报》在 2024 年 6 月用“欢乐日”（rare day of joy）来形容以色列人质被成功解救这一事件，却轻描淡写地略过本次解救行动中造成数以百计的巴勒斯坦人伤亡事实。^④ 在本次冲突有关的报道当

① Jeffrey Gettleman, Anat Schwartz and Adam Sella, “‘Screams Without Words’: How Hamas Weaponized Sexual Violence on Oct. 7”, <https://www.nytimes.com/2023/12/28/world/middleeast/oct-7-attacks-hamas-israel-sexual-violence.html>, 2023-12-28.

② 曹德军：《国际政治话语中的叙事隐喻：情感框定与认知建构》，载《国际关系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74~81 页。

③ Luca GoldMansour, “‘Brutal’ Is a Word Mostly Reserved for Palestinian Violence”, <https://fair.org/home/brutal-is-a-word-mostly-reserved-for-palestinian-violence>, 2024-04-17.

④ Steve Hendrix and Shira Rubin, “For Israel, A Rare Day of Joy Amid Bloodshed as 4 Hostages are Rescued Alive”,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4/06/08/israel-hostages-gaza-hamas>, 2024-06-08.

中，西方媒体不断将本次“阿克萨洪水”行动类比为以色列版的“九一一”恐怖袭击，将对以色列的支持和对乌克兰的支持相联系起来，以实现“支持以色列等于支持乌克兰，也等同于认同西方价值观”这一思维链条，谋取更多中立观众的支持。为此，以色列在社交平台上持续投放广告，不断将哈马斯与“伊斯兰国”等极端恐怖主义组织相联系。例如，以色列在广告视频中，将“伊斯兰国”和“哈马斯”两个名词交替闪烁最终合二为一，并以“世界打败了‘伊斯兰国’，世界将打败哈马斯”为结尾，不断强化二者间的紧密联系，^①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更是直言哈马斯的行为比“伊斯兰国”的行为更加糟糕。^②

不能否认的是，哈马斯的突袭行为对以色列造成了巨大损失，但西方媒体刻意忽视二者在政治诉求、历史缘由方面的巨大差距，意图唤醒美欧国家遭受恐怖袭击的惨痛记忆，以此为以色列博取更多国际同情与支持。事实上，由于以色列对于加沙地带信息的封锁，西方主流媒体对巴以冲突双方的信息获取往往具有局限性，这就导致表达行为的“双标”特征成为媒体获取信息的“副产品”。与直接甚至夸大哈马斯袭击行为不同的是，西方媒体颠倒黑白，试图利用“蒙太奇”式的新闻报道手法来为以色列袭击行为进行辩护。2022年8月，以色列对哈马斯开展空袭行动，巴勒斯坦方面随后进行还击。对此，《泰晤士报》将数月前巴以双方的冲突行动描述为以色列展开袭击的正当原因，通过“嫁接”的手法为以色列的袭击辩护，甚至在缺乏照片证据情况下标注“巴勒斯坦火箭飞向以色列”，借以说明以色列袭击行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③

此外，以色列注重维系与美国的关系，将“保卫以色列”等同于“保卫西方”“保卫民主”，意图借助西方国家“背书”为信息的输出提供权威性与可信度。在冲突爆发后，大部分国家都表达了对哈马斯突袭的谴责，如法国

① Liv Martin, Clothilde Goujard and Hailey Fuchs, “Israel Floods Social Media to Shape Opinion around the War”,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israel-social-media-opinion-hamas-war>, 2023-10-17.

②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Secretary Antony J. Blinken and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After Their Meeting”,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and-israeli-prime-minister-benjamin-netanyahu-after-their-meeting-2>, 2023-10-12.

③ James North, “The ‘NYTimes’ Hides why Israel is Attacking Gaza — Prime Minister Lapid is Running for Re-election”, <https://mondoweiss.net/2022/08/the-nytimes-hides-why-israel-is-attacking-gaza-prime-minister-lapid-is-running-for-re-election>, 2022-08-06.

宣布全面禁止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逮捕公开宣扬“反犹太主义”的极端主义分子^①；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已故以色列人的家人和朋友表示诚挚的哀悼”。^②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呼吁各方停止暴力冲突，返回到政治协商解决的和平道路上。长期以来，以色列都标榜自身为“英雄民主国家”，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对维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有重大关切。^③事件爆发初期，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对本次冲突发声，以色列围绕哈马斯可能的暴力行为信息进行针对性宣传，不断放大哈马斯行为的失当性，与西方媒体共同实施“制造同意”行为，即媒体向公众提供政客和权力中心选择的信息和事实，然后精英们通过媒体塑造民意，并为自身观点赋予其合法性。^④这些被塑造后的信息观点借助官方渠道进行再次的传播与放大，如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强烈斥责哈马斯的暴力行为，认为“世界不能只是视而不见”^⑤，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等政界人士在联合国共同发声，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哈马斯的暴力行为。^⑥但是，当以色列开始实施反人道主义行为后，美国等国家的反应则相对温和，依然维持对以色列的支持。

（二）信息掌控：以色列垄断战场信息源头，选择性干预传统媒体取向

战时宣传从本质来看是不同主体对公共舆论域中信息的选择性上传、传播，因此对信息——特别是原始信息的传播与阐释能力变得极为重要。在本次巴以冲突中，以色列极为注重掌控战场相关信息传播，通过限制信息传播

① 《法国内政部：将加速驱逐外国激进分子》，载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cn/2023-10/17/content_116751986.shtml，2023-10-17。

② “Putin speaks to Netanyahu about Gaza Conflict, Promises Measures to Prevent Escalation”，<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world/middle-east/putin-speaks-to-netanyahu-about-gaza-conflict-promises-measures-to-prevent-escalation/articleshow/104483459.cms>，2023-10-18。

③ Joseph Stepansky and Jillian Kestler-D'Amours,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Lobby Power: The influences Behind Biden’s Support for Israel”，<https://www.aljazeera.com/news/longform/2024/1/30/strategic-interests-lobby-power-what-influences-bidens-israel-support>，2024-01-30。

④ Basim Tweissi, “War in the Post-Truth Era: Western Media Coverage of Israel’s 2023 War on Gaza”，<https://www.dohainstitute.org/en/Lists/ACRPS-PDFDocumentLibrary/western-news-coverage-of-israels-war-on-gaza-in-the-post-truth-era.pdf>，2023-11-11。

⑤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a Campaign Reception | Boston, MA”，<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12/05/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a-campaign-reception-weston-ma>，2023-12-05。

⑥ Amelie Bothol, “Israel-led UN Special Session Condemns World Silence on Hamas Using Rape as Weapon of War”，<https://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led-un-special-session-condemns-world-silence-on-hamas-using-rape-as-weapon-of-war>，2023-12-05。

来削弱负面舆论影响，减少国际舆论中关于以色列的负面信息。^① 为此，以色列从传统新闻媒体与社交媒体两方面着手，既加大相关信息审查力度，降低战场信息曝光度，也质疑对哈马斯宣传内容合规性、真实性，意图削弱敌方宣传效果。

首先，限制传统媒体信息传播。长期以来，以色列都极其严格地控制并审核进出加沙地带的人员身份，以色列甚至拒绝巴勒斯坦人权组织工作人员进入该地区开展活动，并有条件和选择性地允许媒体报道。在以色列政府有权审查新闻原始材料的前提下，西方媒体才能获得进入巴勒斯坦地区进行媒体采访的资格，这导致国际社会对加沙地带的信息获取很大程度上被以色列官方立场左右。而以以色列媒体的信息源与以色列国防军息息相关，其立场不言而喻。

在此次行动爆发后，以色列进一步加强传统媒体信息管制。其一，以色列以安全为由对外国媒体进入加沙地带报道实施限制。虽然以色列相关人员偶尔会发放许可证，但前提是有军方人员陪同且只能进入指定区域，而得到许可证的媒体也以西方亲以媒体为主。这些媒体在巴以冲突新闻报道的立场与以色列官方基本一致，对以色列的不当行为不报道或少报道，很少给出负面评价。其二，以色列以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为由要求外国新闻媒体禁止报道以方在加沙地带的负面新闻。对此，以色列政府通过颁布法律条文、直接对社交媒体施加压力等形式，禁止媒体机构在未经以色列军事审查部门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对包括军事行动、以色列情报、对以色列敏感地点的火箭弹袭击、网络攻击，以及高级军事官员访问战场的细节在内的八大项内容进行报道。^② 因此，西方主流媒体的记者和编辑对于以色列破坏行为的报道的内容和词语选择受到了极大限制，被要求严格限制引用哈马斯和报道其他巴勒斯坦人的观点，甚至尽量少提巴以冲突的历史原因，而着重对本次冲突的直接原因进行报道。^③ 其三，限制亲巴媒体报道或直接武力驱逐记者。^④ 在冲突爆

① Jędrzejewska, Karolina, “Hasbara: Public Diplomacy with Israeli Characteristics”, *Toruńskie Studia Międzynarodowe*, Vol. 1, No. 13, 2020, pp. 112–113.

② “Operation ‘Swords of Iron’ Israeli Chief Censor Directive to the Media”, <https://www.gov.il/BlobFolder/news/8swordsfiron101023/en/operation%20Swords%20of%20Iron.pdf>, 2024–08–04.

③ Chris McGreal, “CNN Staff Say Network’s Pro–Israel Slant Amounts to ‘Journalistic Malpractice’”,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24/feb/04/cnn-staff-pro-israel-bias>, 2024–02–04.

④ Daniel Boguslaw, “CNN Runs Gaza Coverage Past Jerusalem Team Operating Under Shadow of IDF Censor”, <https://theintercept.com/2024/01/04/cnn-israel-gaza-idf-reporting>, 2024–01–04.

发后一个月内，以色列关闭了与黎巴嫩真主党有关的卫星频道（Al - Mayadeen）^①，并在 2024 年 5 月关闭半岛电视台在以色列的业务。^②同时，自冲突爆发后，在加沙地带乃至地区外报道加沙局势的记者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危险，多名阿拉伯媒体记者在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等地被以色列警察、军方逮捕。众多阿拉伯媒体新闻网站更是受到网络攻击，并一度瘫痪。^③其四，选择与以色列关系紧密的非政府组织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源头。亲以色列志愿搜救组织（ZAKA）就是本次事件中报道 Hamas 施行暴力行为的以方信息主要来源。^④由于工作性质，该组织能够获取第一手战场信息，其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误导性信息为以色列对外宣传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一手资料。在 Hamas “性暴力”事件中，该组织便成为主要信息提供者，并通过夸大事实、片面叙事等方式来“暗示”哈马斯的恶劣行为。^⑤对此，内塔尼亚胡高度评价该组织工作，认为“它在影响公众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⑥这说明立场倾向而非信息真实性已成为以色列对外宣传的第一原则。

其次，运用社交媒体限制信息传播。由于社交媒体的信息来源多元，其具有一套平台舆论管制逻辑，会对个人用户上传信息进行识别分类，并删除过于血腥、暴力、民族歧视类内容，但这也成为大部分西方社交媒体删除巴以冲突中部分“违规”帖子的管制借口。事实上，除影响西方传统媒体在新闻报道上秉持亲以立场，以色列政府也借助其美欧地区的强大政治力量对主流网络社交媒体的内容审查、账号封禁等规则施加影响，以实现在社交平台

① Sam Soko, “Government Approves Proposal to Block Hezbollah - affiliated Al Mayadeen News”,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government-approves-proposal-to-block-hezbollah-affiliated-al-mayadeen-news>, 2024 - 08 - 11.

② 《以色列关闭半岛电视台在当地业务》，载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world/story20240505-3586163>, 2024 - 05 - 05。

③ Mohamed Mandour and Doja Daoud, etc. “Attacks, Arrests, Threats, Censorship: The High Risks of Reporting the Israel - Gaza War”, <https://cpj.org/2023/11/attacks-arrests-threats-censorship-the-high-risks-of-reporting-the-israel-hamas-war>, 2024 - 12 - 03.

④ The Short String, “ZAKA is not a Trustworthy Source for Allegations of Sexual Violence on October 7”, <https://mondoweiss.net/2023/12/zaka-is-not-a-trustworthy-source-for-allegations-of-sexual-violence-on-october-7>, 2023 - 12 - 30.

⑤ Tia Goldenberg and Julia Frankel, “How 2 Debunked Accounts of Sexual Violence on Oct. 7 Fueled a Global Dispute over Israel - Hamas War”, <https://apnews.com/article/israel-hamas-war-sexual-violence-zaka-ca7905bf9520b1e646f86d72cdf03244>, 2024 - 05 - 22.

⑥ Prime Minister's Office, “PM Netanyahu Visits ZAKA”, <https://www.gov.il/en/pages/event-zaka231123>, 2023 - 11 - 23.

上巴以冲突信息传播的相对优势。一方面，动员盟友加强对社交平台合规审查。比如，欧盟委员会针对“X平台”处理与哈马斯袭击有关的非法内容和虚假信息是否遵守了《数字服务法》（DSA）中的内容审核条例展开调查，^①并要求谷歌确保油管（YouTube）在内容审核上做好合规审查。为此，社交媒体采取诸多措施屏蔽亲巴勒斯坦声音的传播，如帖子限流等隐蔽手段，或者直接采取关停板块、封禁账户等显性手段围堵巴勒斯坦方发声渠道。比如，脸书、油管和抖音国际版等主要社交媒体平台采取影子禁令（Shadow Banning）做法，在用户使用某些关键字或主题标签（如“FreePalestine”或“IStandWithPalestine”）时隐藏搜索内容，而将哈马斯类比为极端恐怖暴力组织的帖子保留与传播的时间更长。^②美国社交网络巨头元宇宙（Meta）更是暂停了其平台上最大的巴勒斯坦新闻页面巴勒斯坦圣城新闻网（QNN）的运营，^③并删除与封禁了超过千个亲巴勒斯坦帖子与账户。^④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使用平台用户对巴以问题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强化个体认同。相比于传统媒体政治立场、影响受众范围较为固定，社交媒体具有信息投放与获取成本低、受众范围广泛且与传统媒体受众重叠范围小等相对优势。因此，以色列也积极在社交平台上拓展舆论战场以赢得网络信息战。在“阿克萨洪水”行动后短短一周内，以色列政府已在西方主要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社交媒体活动，以争取西方广大民众对其军事行动的支持。比如，以方在重要社交平台上推送数十条包含以色列致命武装暴力的残酷和情感画面的广告。^⑤

最后，以色列不断强化内部信息管制，增强内部政治凝聚力。随着巴以冲突战线逐步拉长，战局陷入胶着态势，以色列社会内部开始出现反对内塔

① Clothilde Goujard, “EU Starts Probe into Musk’s X over Hamas Content”,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starts-probe-into-musks-x-over-hamas-content>, 2023-10-12.

② Priyanka Shankar, Pranav Dixit and Usaid Siddiqui, “Are Social Media Giants Censoring Pro-Palestine Voices amid Israel’s War?”, <https://www.aljazeera.com/features/2023/10/24/shadowbanning-are-social-media-giants-censoring-pro-palestine-voices>, 2023-10-24.

③ . AhlulBayt News Agency, “US Company Meta Removes Largest Palestinian News Page from Facebook”, <https://fa.abna24.com/story/1401276>, 2023-10-23.

④ Middle East Moniestor, “Meta Accused of ‘Systemic Censorship’ of Pro-Palestine Content”,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231221-meta-accused-of-systemic-censorship-of-pro-palestine-content>, 2023-12-21.

⑤ Liv Martin, Clothilde Goujard and Hailey Fuchs, “Israel Floods Social Media to Shape Opinion around the War”,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israel-social-media-opinion-hamas-war>, 2023-10-17.

尼亚胡政府与反对冲突的声音。为此，以色列政府迅速反应，对内实施宣传管制。其一，以色列剥夺民众反战示威的权力，但支持战争或呼吁犹太人在加沙定居的右翼示威许可却获得了政府与法院批准，不需要许可证的小规模示威活动则被执法机关暴力驱散。^①其二，运用国家强制力对异议组织乃至个人进行调查和起诉。截至 2023 年 11 月底，以色列警方以煽动恐怖主义和认同恐怖组织的罪名进行 269 项调查，并起诉了 86 人。^②其三，引导国内主流新闻转向明确爱国立场，进行选择性地报道，而边缘媒体在大环境压力下只能迎合主流观点。在这些举措引导下，批评被视为失败主义、不爱国，甚至是叛国行为，在舆论方面以色列内部形成“恐惧气氛”。通过这些措施，以色列试图从根源上防止亲巴勒斯坦声音通过科普历史等方式来抵御以色列方的言论攻击，“修复”被以色列攻击后的叙事框架，以此降低巴勒斯坦叙事结构影响力。

（三）国际主体协同：宣传网络构建与应用新兴技术

多年来，以色列为赢得巴以问题主动权，持续实施对外宣传，以系统化、长期性地输出观点和言论、培养海外民间组织等方式构建国际舆论传播大网，意图长久性、根本性、潜移默化地建立并完善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的预期正面形象，夯实其对巴以问题的解读权。

一方面，以色列建立系统宣传网络，从官方、海外组织、公民个体 3 个维度集合力量、增进共识并阻碍负面信息传播。其一，以色列建立了以总理办公室为核心，涵盖侨民与公共事务部、国防军发言人、“领土政府活动协调处”“外交部公共外交局”等机构，具备协调中心、施行主体与政策制定功能的宣传系统。在该系统布局下，以色列通过定期会议论坛、国家品牌形象与危机管理、组织训练国内外群体、“定制化”宣传等方式与国内外机构共同培育亲以学生团体、意见领袖与组织机构，在各大舆论领域当中为以色列宣传造势。其次，犹太财团、以色列外交部等主体长期通过向非政府组织捐款等方式在海外培育亲以组织。这些组织可以监督他国政府或社会组织中的反犹太主义思想动态，以游说方式联合他国政治主流、针对性攻击并拔除反犹太复国主义势力，从而在他国建立更有利于以色列的政策与社会舆论环境，业

^① Adam Shinar, “Free Speech in the Shadow of the Israel - Gaza War”, <https://verfassungsblog.de/free-speech-in-the-shadow-of-the-israel-gaza-war>, 2024 - 01 - 24.

^② “לפעולה זו צוותה הכנסת HamasIsISIS#: ”ההאשג את שהמצאה סוגל זה הט תחבלוגר” <https://www.ynet.co.il/news/article/b11j19gha>, 2023 - 10 - 25.

已形成协同成熟的体系。^① 再次，注重以民众个体为宣传载体的宣传方式。早在2010年，以色列就曾发起“宣讲以色列”（Masbirim Yisrael）行动，通过给以色列民众提供包括以色列神话、历史和突出成就的文件材料，鼓励本国公民向外国公民进行国家文化与形象宣传。^② 世界犹太学生联盟曾出台政策文件，系统性地指导大学生如何在学校内推广以色列形象，强调使用“中和负面”与“推广正面”的行为路径来维护以色列的声誉。与此配套设立的哈斯巴拉奖学金（Hasbara Fellowships）则通过教导获奖美国学生学习打击反犹太主义和反以色列宣传的相关知识，使其自觉成为校园内乃至地区性的亲以色列代表。^③ 通过这些方式，以色列在西方国家校园和社区内打造了坚实的亲民意基础。

在本次巴以冲突中，以色列继续采用以上3个维度充分发挥自身在对别国政治发展、社会舆论传播方面的影响力，打击反犹太主义势力及活动，从根本上阻止反以色列抗议局势的扩大。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开展空袭后，美国大学校园当中出现规模庞大的反以声音，抗议活动此起彼伏。为此，以色列外交部通过其在美国建立的非政府组织与美国工会进行联系，讨论修订并通过相关条例，要求大学打击校园内反犹太主义势力，甚至镇压、抓捕相关活动的主办人员，并威胁解雇涉事教师。^④ 而犹太裔名流与商人或直接动用私人关系，要求美国地方政府迅速镇压反以群体抗议活动，或以断绝巨额捐款为威胁，要求美国大学打击并禁止学生参与反犹活动，从根源上断绝国际社会对哈马斯的宣传支撑。

另一方面，以色列战时宣传行为扩展到数据信息域中，利用数字技术引导大众反对巴勒斯坦自决并支持以色列“合法”占领。^⑤ 以色列通过广告投放、社交机器人宣传、虚假信息传播等方式引导涉及巴以问题的信息流，利

① “The Hasbara Apparatus: Units, Tasks and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http://www.molad.org/images/upload/files/37830581085043.pdf>, 2024-10-25.

② Gil Stern Hoffman, “Public Diplomacy Web Site Finally Appears in English”, <https://www.jpost.com/israel/public-diplomacy-web-site-finally-appears-in-english>, 2010-09-15.

③ WUJS, “Hasbara Handbook: Promoting Israel on Campus”, <http://www.middle-east-info.org/take/wujshasbara.pdf>, 2024-03-23.

④ William I. Robinson, “Israel Has Formed a Task Force to Carry Out Covert Campaigns at US Universities”, <https://truthout.org/articles/israel-has-formed-a-task-force-to-carry-out-covert-campaigns-at-us-universities>, 2024-03-23.

⑤ Miriyam Aouragh, “Hasbara 2.0: Israel’s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Digital Age”, *Middle East Critique*, Vol. 25, No. 3, pp. 271-297.

用内容的重复性传播淹没公共信息场域，强化以色列自身的叙事框架，以期占据道德高地、赢得民众支持。其一，以色列通过社交媒体网络向用户“广撒网”，确保各类用户都会受到影响，进而借助算法推送相关信息流，反复灌输亲以观点，逐渐搭起信息茧房，形成对以色列的有利认知。根据以色列官方数据，自“阿克萨洪水”行动 6 个月内，以色列建立了包括英语、俄语和阿拉伯语等语言、涵盖全球媒体频道的广播演播室，接受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的采访上千次，并建立“10 月 7 日哈马斯大屠杀”网站以展示哈马斯造成的伤害。^① 根据谷歌数据，自此次“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以来，以色列外交部已经在包括油管在内的谷歌旗下平台投放大量广告，内容主要展示此次冲突中的受害者图像等，暗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区军事行动的必要性。^② 以色列还在部分内容中重点标注与突出“哈马斯就是‘伊斯兰国’”（HAMAS IS ISIS）字样，持续性强化二者关系。^③ 在美国大型体育比赛中，以色列政府广告局积极投放覆盖影响美国的数千万人、介绍被哈马斯扣押的 126 位人质信息的广告，旨在构建信息茧房，减少美国反犹太主义运动。^④ 其二，以色列在信息传播中注重应用社交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从提供行为支撑与宣传悲惨形象两方面为其行为博取支持。例如，以色列曾针对巴勒斯坦希法医院（Al-Shifa）的用途进行虚假信息宣传，通过发布该医院“3D”渲染图，声称坐落在数个隧道汇集处的医院可被哈马斯用以作为指挥中心与扣押人质。尽管事后调查发现该医院中并无任何军事力量入驻痕迹，但以色列仍以此作为轰炸该医院的缘由，^⑤ 此外，在本次冲突爆发后，以色列推出在线平台“真

①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Six Months of the War on the Global Public Diplomacy Front: The National Public Diplomacy Directorate Presents its Activ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fter Six Months of the War", <https://www.gov.il/en/pages/explanation100424>, 2024-04-10.

② "Google Advertising Transparency Center", <https://adstransparency.google.com/?region=anywhere&start-date=2023-10-07&end-date=2024-07-11&platform=YOUTUBE>, 2023-10-07.

③ Al Arabiya English, "Israel Runs Online Campaign Targeting Europeans with Shocking Images of Hamas Attack", <https://english.alarabiya.net/News/middle-east/2023/10/31/Israel-runs-online-campaign-targeting-Europeans-with-shocking-images-of-Hamas-attack>, 2023-10-31.

④ Stuart Winer, Tol Staff, "Israel launches Gaza Hostage Awareness Video Campaign for Super Bowl Weekend",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launches-gaza-hostage-awareness-video-campaign-for-super-bowl-weekend>, 2024-02-11.

⑤ Tariq Kenney-Shawa, "Israel's Disinformation Apparatus: A Key Weapon in Its Arsenal", <https://al-shabaka.org/briefs/israels-disinformation-apparatus-a-key-weapon-in-its-arsenal>, 2024-03-12.

相以色列”（Project Truth Israel），声称其搭载的人工智能可以为用户验证有关本次冲突信息的真实性。^①同时，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出现了数百个对巴勒斯坦袭击活动进行针对性宣传、后经验证均是社交机器人的账号。这些账号在冲突爆发后大量转载以色列遇袭的图片与视频，将大众关注聚焦于以色列受袭的情境中，并以煽动性语言激发受众对以色列同情、对巴勒斯坦愤怒情绪。实际上，哈马斯并不等同于巴勒斯坦，它只是巴勒斯坦的武装派别之一，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上述媒体通过偷换概念，引导错误认知。不仅如此，在西方国家内部出现断绝对以色列援助的声音时，以色列大规模使用虚假的社交媒体账户“伪造民意”，在具有立法权力的官员账号下传播亲以言论，劝说他们继续为以色列军队提供资金。^②这些行为都为其战时宣传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三 以色列战时宣传的“阿喀琉斯之踵”

不可否认的是，以色列的战时宣传行为在早期帮助以色列的反击行为博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在冲突早期助推国际社会更快形成谴责哈马斯的舆论潮。从冲突爆发后短期舆情中，以色列迅速围绕自身反击的正义和理性搭建了逻辑自洽的话语信息螺旋，对关注冲突信息的观众施加广泛影响，进而树立以色列的受害者形象。但随着战局陷入胶着，舆论风向迅速扭转，以色列反击行为受到国际社会中大多数国家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效果逐步下降，具体行为和宣传内容的背离让宣传内容的真实性与可信度急剧下降，以色列战时宣传落入低谷。

（一）积重难返：“剑走偏锋”的国家安全观催生安全困境

正如哈马斯发布的《我们的叙述——阿克萨洪水行动》一文内的阐述，“在75年无情的占领和苦难之后，在所有争取解放和回归我国人民的倡议都失败之后，在所谓的和平进程产生灾难性后果之后，世界期望巴勒斯坦人民

^① ABRAHAM BREE, “The Digital Battleground of Social Media: Embracing Cyber Advocacy for Israel’s Defense – opinion”, <https://www.jpost.com/opinion/article-799899>, 2024-05-11.

^② Sheera Frenkel, “Israel Secretly Targets U. S. Lawmakers with Influence Campaign on Gaza War”, <https://www.nytimes.com/2024/06/05/technology/israel-campaign-gaza-social-media.html>, 2024-06-05.

对下列问题做出什么反应?” 哈马斯在此文中列举了以色列定居者入侵清真寺、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数千名巴勒斯坦人被剥夺基本权利、加沙地带遭受长达 17 年海陆空封锁等情况。^① 这揭示了巴以冲突循环往复、难以解决的根源在于, 以色列长期将自身安全需要凌驾在巴勒斯坦人的安全需求乃至生命需求之上。这不仅导致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生存与发展权利难以得到保障, 更让他们的“声音”难以被听见, 最终巴勒斯坦一些人则诉诸非常规手段以寻求破局。在 1967 年六五战争爆发后, 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 大幅压缩巴勒斯坦人民生存空间; 1993 年巴以双方签署的《奥斯陆协议》, 将约旦河西岸划分为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控的 A 区、巴以双方共管的 B 区与由以色列控制的 C 区。但以色列罔顾协议内容, 多次无视监管范围进入不同区域展开军事行动, 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常经贸发展造成极大影响。之后, 以色列多次在各个分管区安设数以百计的犹太人定居点, 并通过建立检查站和根深蒂固的军事存在分隔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更是控制了农田和饮用水等关键资源。^② 与此同时, 以色列还在加沙地带设立隔离墙以限制居住在此的巴勒斯坦人生存权和人身自由。^③ 进入 21 世纪, 以色列继续扩大犹太人定居点规模, 使得巴勒斯坦实际控制的领土不断缩小并日益村落化、碎片化和虚无化。^④ 以色列以此来不断强化对巴勒斯坦控制地区的能力发展限制乃至生存限制, 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生活水平被控制在较为原始的状态, 许多百姓甚至被限制使用电力等基本民生设施。

以色列长期罔顾联合国裁决与国际社会谴责, 对巴勒斯坦人民展开持续性的压迫, 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以色列将国家安全当作政治的核心议题^⑤, 在巴以问题上秉持“绝对安全”价值观, 无视与国际社会所存在的巨

① The Hamas Office Meida, “Our Narrative - - - Operation Al - Aqsa Flood”, <https://www.palestinechronicle.com/wp-content/uploads/2024/01/PDF.pdf>, 2024 - 01 - 24.

② 黄日涵:《在巴以争议地区投资, 中企要小心》, 载《环球时报》2017 年 12 月 20 日。

③ United Nations,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Israel has Imposed upon Palestine an Apartheid Reality in a Post - apartheid World”,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2/03/special-rapporteur-situation-human-rights-occupied-palestinian-territories>, 2022 - 03 - 25.

④ 孙德刚、马文媛:《巴以冲突的治理难题与前景分析》, 载《和平与发展》2024 年第 1 期, 第 141 页。

⑤ 吴昊昱:《安全、武力与自助: 以色列的国家安全研究》, 载《国际政治研究》2022 年第 3 期, 第 79 页。

大价值观差异，长期忽视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生存权、回归权^①。以色列意图彻底瓦解任何可能的安全威胁，并支持与以色列合作的有效的巴勒斯坦政权。^②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更是多次宣称，我们“不会在以色列对约旦河以西所有领土的全面安全控制上妥协”。^③ 这非但不能让以色列理智正视巴以问题的本质与根源，反而只能让以色列跌入“自说自话”的“安全困境”无法自拔，让双方种族矛盾不断加深、仇恨情绪不断积聚，最终让失去生存空间的一些绝望的巴勒斯坦人通过非和平手段发动军事袭击。因而，在本次“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后，以色列朝野震惊，一致认为应彻底铲除哈马斯，并将直接将军事战略目的置于国际舆论和人道主义道德考量之上，对加沙地带开展无底线的攻击，这最终演化成为人道主义灾难。因此，以色列对巴以问题偏激的安全认知是推动以色列在此轮巴以冲突中施为的根本原因。

（二）背道而驰：战时宣传背离战场事实与效能下降

从客观事实上看，以色列自身行为对国际道德与人权的践踏是导致其陷入舆论谴责的直接原因，并导致其耕耘已久的国际话语权与公信力逐渐瓦解。从实际情况来看，哈马斯的突袭行为无助于巴以问题的解决。但此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袭击医疗设施、轰炸难民营等激烈的军事行动，已经超出了“反击”的合理范畴，激起国际社会各方的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其宣传中一直宣称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丝毫不顾及巴勒斯坦人民的发展和生命权，更是意图将巴以冲突难以解决的原因归咎到巴勒斯坦人身上。以此为出发点，以色列开展大规模、持续性的武装攻击：从拒绝国际人道主义组织进入加沙地带援助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民，到攻击巴勒斯坦平民聚集地，以色列基于其炮制“巴勒斯坦人都可能是潜在武装分子”观点所实施的人道毁灭行动，其打击范围逐渐扩大，巴勒斯坦乃至周边国家的无辜

① 习近平：《推动停火止战实现持久和平安全——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上的讲话》（2023年11月21日，北京），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11月23日。

② Dan Meridor and Ron Eldadi, “Israel’s National Security Doctrine: Th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Formula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Doctrine (Meridor Committee), Ten Years Later”, https://www.inss.org.il/wp-content/uploads/2019/02/Memo187_11.pdf, 2019-02-12.

③ Peter Beaumont, “Netanyahu Tells US he Opposes Creation of Palestinian State after Gaza War”,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4/jan/18/netanyahu-tells-us-opposes-palestinian-state-after-gaza-war>, 2024-01-18.

人民都被以色列的炮火所覆盖。该行为不仅远远偏离过往其构建的角色设定与声誉，更让国际社会开始回溯与思考巴以冲突久拖未决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种反思直接让国际社会态度翻转，以色列单方面的偏激行为与巴以冲突根源的反差让国际公众感受到了“欺骗”，开始质疑其行为的合理性基础，并逐步转化为对以色列行为的抗议和谴责。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对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展开批评，如巴西总统卢拉公开将以色列袭击加沙地带难民行为等同于“希特勒当年对犹太人的屠杀”^①；联合国要求以色列开放国际援助渠道、停止空袭行为等。但是这些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并未能阻止以色列继续采取激烈的军事行动，上述情势由此进一步恶化了国际公众对于以色列的印象与看法。

除此之外，以色列在战时宣传中存在宣传主体协调低效、宣传话语脱离受众价值观等问题，这说明其过去坚持的全球范围的长期性、系统性、针对性宣传策略已经难以为继，其宣传效果正在逐步下降。在绝对化、极端化的安全观影响下，以色列战时宣传目的逐渐模糊甚至盲目，忽视了受众对于以色列后续宣传内容的理解与认可。一方面，以色列围绕巴以问题开展的长期性、常态化宣传在投入资源上消耗过大。特别是在此次事件爆发前，以色列方未能预料到巴以冲突会再次以军事对抗形态爆发，这导致其资金与技术准备不足，未能在激烈态势下维持或扩大自身在巴以问题上话语宣传体系。尽管在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广泛开展宣传，但其支撑资金迅速陷入短缺状态，使其紧急抽调资金避免宣传活动中断。^② 另一方面，以色列战时宣传具体策略存在宣传对象不明晰、重点模糊等情况，致使其观点前后矛盾，受众难以接受。在宣传对象上，以色列战时宣传主要寻求西方国家非犹太裔群体共识，并使用西方观众更能共情的话语组织方式与价值观展开宣传，但其忽略了两方对待巴以问题的思维差异。在国内宣传中，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地区领土的占有是天然合法的，“阿克萨洪水”行动的爆发更加巩固了以色列对加沙地带施加军事统治策略的合理性。因此，以色列坚决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更不会对巴勒斯坦人“手下留情”。所以，当国际社会开始普遍承认巴勒斯坦国

^① 《卢拉将以色列对加沙袭击比作纳粹德国大屠杀，以总理怒称“越过红线”，载环球网：<https://news.ifeng.com/c/8XIMhzz6aoc>，2024-02-19。

^② Arielia Marsden, “Foreign Ministry Stalls Hasbara over Lack of Budget”, <https://www.jpost.com/israel-news/article-773382>, 2023-11-15.

时，以色列外交部长认为此举是“串通煽动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和战争罪行”。^①但从国际观众视角看，自“阿克萨洪水”爆发至今，加沙地带在遭受猛烈打击情况下， Hamas 仍能克服武装劣势而发动反击，挖掘地道反击、平民百姓的悲惨遭遇、首领战死等信息强有力地冲击了国际社会乃至以色列内部的认知，这种图景影响了国际社会与以色列内部的民意和舆论。随着冲突战线的不断拉长，以色列内部裂隙越来越大，内塔尼亚胡的国内政治基础逐步松动：利库德联盟的支持率近期不断下跌，而 2024 年 1 月内塔尼亚胡本人的国内支持率跌到近 15%，在近期有所回升的情况下也仅有 43%。^②以色列开展袭击行为的国际正当性几近瓦解。

（三）后发制人：哈马斯充分的政治动员与宣传

在本次冲突中，作为发起方的哈马斯在冲突爆发后也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动员与宣传，意图占得宣传先机。首先，哈马斯注重使用不同风格的叙述方式以博得不同受众的理解与同情。对于具有类似宗教背景的受众，哈马斯在早期战时宣传上反复强调此次突袭行动的“正义性”，在宣战解读中不断使用词义联想等方式，向国际社会叙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地区人民的长期压迫的事实，意图博取国际社会同情。例如，参与此次行动的前卡桑旅领导人穆罕默德·戴夫（Mohammed Deif）在动员士兵时，不断强调“战斗，天使会和你一起战斗”“你们的抵抗运动加入巴勒斯坦人民的那一天已经到来，这样这些懦弱的占领者就会明白，他们挑衅的时代已经结束”等等，控诉以色列对于阿克萨清真寺的暴力行动，以此强调自身行为的“正当性”与“正义性”。^③这些做法博得了伊朗、叙利亚等国一些民众的支持。对于其他文化背景的公众，哈马斯则在宣传中强调巴勒斯坦人具有追求普适性的人权生命与行动自由等权利。哈马斯在冲突爆发后，借助国际舆论聚焦的契机发布报告，以基于对西方国家社会群体具有特定情感影响力的叙事方式，强调以色列对巴勒

^① The Associated Press, “Ireland and Norway Recognize a Palestinian State. Why does that Matter?”, <https://apnews.com/article/israel-hamas-war-palestinian-state-recognition-what-to-know-ed18d4cc50b20c8238e0de0068080eb0>, 2024-05-28.

^② Khaled Yousef, “Israeli Public Opinion Shifts on Netanyahu as Prime Minister Regains Support”, <https://www.aa.com.tr/en/middle-east/israeli-public-opinion-shifts-on-netanyahu-as-prime-minister-regains-support/3353576>, 2024-10-07.

^③ “We Announce the Start of the al-Aqsa Flood”, <https://www.oasiscenter.eu/en/we-announce-the-start-of-the-al-aqsa-flood>, 2023-12-13.

斯坦地区的占领行为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强调巴勒斯坦地区开展本次作战行动最终的正义目的等等，以维护民主人权的名义向公众呼吁支持。^① 这些行为都为哈马斯利己性阐释突袭意图、普及斗争历史提供了舆论支持。

其次，哈马斯在信息战中最大化利用有限的宣传渠道及资源，回应以色列方利用西方媒体及虚假消息进行的抹黑行为，极力维持着哈马斯在巴以问题上残存的信息与话语，拒绝被以色列扫除出国际信息交换场域。在本次巴以宣传战当中，面对来自以色列在信息宣传方面的围追堵截，哈马斯整体处于守势，只能将有限资源主要集中在呈现战场真实信息、澄清以色列抹黑等重点领域当中，并尝试利用虚假信息传播等方式对抗以色列的传播行为，持续保护其自身的叙事逻辑结构和内容。一方面，从宣传渠道来看，为躲避以色列对社交媒体的封锁，哈马斯选择电报（telegram）这一难以被封禁的平台，作为实时发布战事进展，对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以及劫持人质的照片、视频等的重要渠道。而受限于以色列对于战场信息的封锁，公众和学者对战事场景的好奇客观上助推哈马斯宣传范围的扩大。有分析数据显示，自冲突爆发以来，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的电报账号粉丝数大幅增长。在冲突爆发前一年内，该账号粉丝数仅增长 2 万。而仅在 2023 年 10 月 7 日当天就有 13.5 万新增订用户^②，相关帖文的浏览量更是暴涨超过十倍。而在其他社交媒体当中，由于平台禁止哈马斯相关账户发声，因此哈马斯通过虚拟账户制造虚假信息来扰乱大众所接收到的信息流，来抵御以色列在主要平台上对哈马斯的负面言论攻击。有以色列社交媒体公司发现，在冲突爆发后不久，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约有 4 万个虚假账户发表数百条支持哈马斯的内容。这些早已建立的账户直到冲突爆发后才被激活，更是超过 1/4 的参与巴以冲突辩论的账户为虚假的社交机器人。^③ 另一方面，在宣传内容上，哈马斯注重使用第一人称摄影、录制人质视频等方式直观呈现战场真相与态势，着力于展示真正情况，用富有冲击力的镜头和内容突破以色列对于战场真实信息的单方面表达。在冲突爆发后，哈马斯大量使用第一人称镜头记录其军队实施突袭

^① “Our Narrative - Operation Al - Aqsa Flood”, <https://workersbushtelegraph.com.au/2024/01/23/operation-al-aqsa-flood-explained>, 2024 - 01 - 21.

^② 《巴以冲突第二战场：一场激烈搏杀的舆论战》，载新华网：http://www.news.cn/world/2023-10/24/e_1212292984.htm, 2023 - 10 - 24.

^③ Zachy Hennessey, “1 in 4 Social Media Accounts Discussing Hamas Right Now is a Terrorist Bot”, <https://www.jpost.com/business-and-innovation/tech-and-start-ups/article-767925>, 2023 - 10 - 12.

行动的过程，向国际社会传递信息，表明以色列并非不可战胜，意图向其他中东国家表明哈马斯是对抗以色列的主要力量，鼓舞其他势力一同对抗以色列。^① 遭遇袭击威胁的巴勒斯坦人民也通过摄像头如实记录加沙地带生活的现实状况，以反击以色列对其单方面的叙事攻击。例如，巴勒斯坦裔电影制片人比桑·奥达（Bisan Owda）化身战地记者，把他在加沙地带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并上传至网络上，展现了加沙地带人民日常的艰苦生活与躲避炮火袭击的情况，直接反映以色列所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的可怕后果。这些行为如如实记录战场真实状况，让国际社会公众直接感受到战场态势与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

此外，部分阿拉伯国家媒体对以色列暴力行为的揭示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哈马斯宣传提供解释与反击的渠道。例如，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长期坚持以巴勒斯坦人民视角报道本次行动中各方的伤亡情况，这些做法都有利于提高哈马斯的宣传效果。

（四）议题遮蔽失败：新媒体助力打破以色列宣传壁垒

互联网让国际舆论传播呈现极为显著的“去中心化”特征。其一，过往政治精英通过掌控纸质媒体的内容制作与传播印刷渠道、把控有线电视传播影像资料进而垄断国际与国内信息流动与传播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特别是近年来移动互联网与智能移动设备的普及度大幅提高，公民对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脸书为代表的实时信息网络与公共讨论平台的广泛使用，使得信息流动从过往的单向流动加速甚至完全转变为多中心、多方向流动。这些兴起的媒介不再像传统媒体那般被美西方国家所垄断，更已经成为大多数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这也是为何本次“阿克萨洪水”行动的影响远超此前 21 世纪以来巴以冲突热度的原因。其二，以社交媒体平台为媒介，信息传播的碎片化趋势愈发严重，国家对信息的解读权威性往往会受到其他主体的挑战乃至解构。在信息上传权分散到基层个体的背景下，主体对所需信息获取的多渠道让信息封锁难度大大上升。多信息供给源的互联网对信息的留存确保各主体能够通过不同信息来源对同一事实信息进行交叉验证，进而实现对信息的真相验证。其三，信息传播中的个体，尤其是具备庞大受众的

^① Eric Cortellessa, “The Oct. 7 Massacre Revealed a New Hamas Social Media Strategy”, <https://time.com/6330005/the-oct-7-massacre-revealed-a-new-hamas-social-media-strategy>, 2023 - 10 - 31.

意见领袖输出自身立场的信息话语的门槛极低。这就使得国家意图通过信息垄断制造“人造真相”的困难越来越大。

在此次巴以冲突中，追求真相的群体规模及能力已经足够戳破以色列所构筑的信息围墙。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民、战地记者等通过拍摄视频、人员采访等形式，快速将客观事实分散式传播到各大平台当中，分散性传播大大超出了以色列的信息与舆论封锁能力。这种情况让宣传弱势方巴勒斯坦方面获得足够的突破机会窗口，让曾长期被遮蔽的巴以议题重新进入到国际社会的讨论当中，并逐步通过历史回顾等方式重构自身行为的合理性逻辑，进而赢得宣传战。因此，尽管西方媒体在冲突早期通过信息舆论影响和报道哈马斯的行为，但历经事件发酵与事实核查，有关战场的真实信息披露越来越多，不仅西方媒体所作的“伪证”被慢慢戳破，越来越多公众开始透过现象看本质，同情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压迫，转而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与抗议。随着媒体对二者关系叙事探讨的深入，巴勒斯坦人民在二战后遭受的人权压迫与生命威胁逐渐被大众所了解，其蕴含的“寻求自由”“寻求独立”信息表征极其符合西方价值观念。这导致巴以双方的正当宣传资源质量和影响力天平加速向巴勒斯坦方面倾斜。例如，一些美国国内大学的师生在面临来自政府官员的解雇和逮捕威胁时，仍进行抗议活动。专注于揭露不公正信息与腐败信息的拦截者（the intercept）网站，曾就“哈马斯对以色列妇女施加暴力行为”这一议题展开深度调查，发现刊登方《纽约时报》曾干扰文章撰写者，并对文章内容进行了取舍，且消息多来源于匿名以色列官员和有亲以背景的工作人员。上述报道不仅缺乏可靠的第二信息来源来佐证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而且还误导性地断章取义死者亲属的表达内容，不断暗示哈马斯对他们施加不当行为。^① 随着越来越多类似报道的不真实性被揭露出来，西方新闻媒体报道遭到越来越多受众的质疑，国际社会更愿意关注巴勒斯坦人民的悲惨遭遇及受难历史，对于以色列的同情快速转变为对其暴力行为的愤怒之情。与此同时，随着战场信息源越来越多元化，社会公众逐渐对战场的真实情况、双方受害者信息有更加清晰地了解，以色列所搭建的宣传话语框架快速失去公众支持。

^① Jeremy Scahill, Ryan Grim and Daniel Boguslaw, “Between the Hammer and the Anvil”, <https://theintercept.com/2024/02/28/new-york-times-anat-schwartz-october-7,2024-02-28>.

同时，由于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干预乃至控制信息舆论的行为极其不满，以色列对西方新闻媒体的干涉效果越来越差。包括美联社、法新社、《纽约时报》在内的西方媒体向以色列签发公开信，要求以色列开通前往加沙地带的新闻媒体通道，以保证对巴以冲突新闻报道的公正性与真实性。^① 随着越来越多真相被揭开，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的内容关注度已经高于以色列，并且对二者的支持也逐渐呈现两极分化。例如，在抖音国际版上二者内容的相关热度相差甚远，“与巴勒斯坦站在一起”（#StandWithPalestine）的标签热度已经远远超过“与以色列站在一起”（#StandWithIsrael）。国际媒体现在正逐步聚焦于战场态势、以色列激烈的军事行动等更引人注目的议题。

在以上因素影响下，国际社会对于此轮巴以冲突的认知和支持发生巨大转变：随着事态发酵，以美国为代表的支持以色列行为的西方国家开始斟酌乃至撤销对其支持，避免损伤本国声誉。这表明以色列的行为正越来越得到众多国家的反对，在舆论宣传当中走向失势。以色列对国际法权威——国际法庭与联合国相关提案与诉讼的蔑视，将原本处于中立立场的国家推离。无视国际谴责、对巴勒斯坦人民开展的激烈的军事行动，更是直接解构了以色列苦心孤诣构造出的“受害者”形象，颠覆了其长期构建的以弱胜强的叙事框架。以色列的战时宣传非但不能赢得舆论支持，反而被国际社会指责，逐渐呈现颓势。其本质在于，战时宣传效果欲达其“势”，关键在于能否得其“道”；需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而不是寻求对抗的、孤立的、绝对的安全环境。

四 结语

自巴以分治近百年来，巴勒斯坦地区人民久久未能盼来和平。在此期间，巴以双方出现了众多烈度不一的各类冲突。 Hamas 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及其事件的持续发展变化，实际上也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突出表现。与地面战场相对应的是，此轮冲突早期以色列凭借其强大的宣传能力在国内外民众认知中搭建起较为完善的话语逻辑及叙事框架，获得舆论战、信息战优势，

^① “Media Organizations Urge Israel to Open Access to Gaza”, <https://cpj.org/2024/07/media-organizations-urge-israel-to-open-access-to-gaza>, 2024-07-11.

在国内外公众心中搭建起较为完善的话语逻辑及叙事框架，哈马斯的突袭行为更是让以色列获取到其所需的宣传材料，在大范围的宣传攻势下以色列向外界塑造了“受害者”形象，一时获得一些国家的同情。但随着双方地面战场陷入胶着态势，以色列战时宣传行为愈发激进，意图将本次哈马斯的行为“定调”为巴以问题久未解决的原因，将哈马斯非国家行为体与巴勒斯坦国家混为一谈。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媒体技术加持下，国际公众逐渐戳破以色列拉起的“舆论帷幕”，以色列再难以阻拦网络信息的流转，以色列战时宣传信息和行为的可信度与国际上的同情感快速下降。而伴随着以色列造成越来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越来越多虚假故事和信息被戳破，以色列构筑的“受害者”角色被逐步瓦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际开展的激烈的军事行动不仅自毁叙事优势，让已经建立的宣传资源逐渐难以为继，更让标榜“自由正义”的西方媒体与政府避之不及，以色列在国际上空前孤立。

2025 年 1 月 15 日，以色列与哈马斯就加沙地带停火达成协议，但前景仍存在变数。本轮巴以冲突引起人们的警醒与理性反思，它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的启示是：平息巴以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两国方案”，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各国欲寻求持久和平之道，需摒弃对抗的、孤立的、绝对的安全旧观念，构建互信、平等、包容、协作的国家安全体系。宣传手段作为实现一国安全之“战术”，其成败的决定因素更在于国家安全战略观是否理性与正确。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